

第三届全国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论文

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

熊 必 俊

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条件,其中包括自然环境、人口、文化、物质生产方式等等。如果说自然环境是社会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条件,那么人口则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社会的主体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之间的本质联系,论述了社会经济发展决定人口发展,人口发展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社会发展,是一个国家调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总能力的综合表现,又被视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总体水平的基础表达^①。人口老龄化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既涉及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又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代际经济交换,是一个需要用系统工程方法加以综合处理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国的社会在发展,人口在老化,研究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采取有效的对策与措施,使两者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趋向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一、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加大的动态过程。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三大因素是出生、死亡和迁移。对于一个封闭人口来说,迁移的作用很小,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了老年型社会,尽管它们成为老年型国家的时间有早有晚,但是老龄化的原因都是相同的,早期主要是出生率的下降。在老龄化中后期死亡率下降也加剧了人口进一步老化。而这些都是在社会发展、生产力提高和经济繁荣的过程中出现的。

在生产落后和社会发展缓慢的自然经济阶段,人口死亡率很高,平均寿命很短,据统计,18世纪中到19世纪末发达国家的死亡率为30~40%,发展中国家更高一些,为36~38%。高死亡率必然导致高出生率,因而同期发达国家的出生率为38~39%,发展中国家为40~41%^②。亚当·斯密说:“贫困似乎会促进繁殖”,加利阿尼在《货币论》一书中指出:“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馑和瘟疫以前,与其说是妨碍人口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史实表明,在社会发展水平低、死亡率高、出生率高和平均寿命低的情况下,老年人口比重小,人口年龄结构呈正金字塔形,不可能出现人口呈年轻型年龄结构。

产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加速了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人口过程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营养条件的改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的发展,增强了人们的抗病、治病能力,使人口死亡率下降。发达国家人口死亡率从产业革命前的34%下降到19世纪上半叶的32%和下半叶的29%,表现为人口死亡率持续明显下降的第一次人口革命。

工业化生产把原来追求劳动力数量转换为强调劳动力质量;家庭在收入支配上开始把法

^① 引自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研究会1994年课题研究计划。

^② 郭沧萍:《人口老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载中国老年学学会编《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版。

码加在提高子女的质量上而不是加在数量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妇女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参与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妇女参加工作使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母亲在孕期和抚育孩子期间所放弃的收入)大大提高,从而使人们趋向节制生育。退休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改变了人们“养儿防老”的生育观。从而使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从19世纪下半叶的38%下降到20世纪10年代的26%和30年代的22%,表现为继死亡率下降后人口出生率也持续下降的第二次人口革命。在两次人口革命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比重普遍增加,法国、瑞典、英国、爱尔兰、德国相继成为老年型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进入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

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经历产业革命,但是随着经济独立、生产力提高、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有些国家的死亡率和出生率都在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在上升,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以色列、古巴、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已成为老年型国家。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预计进入下个世纪后,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将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进入老年型社会。中国将在本世纪末成为老年型国家。

二、对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的再认识

人口是社会生产力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要素。当我们讲人是生产者时,是就人的本质而言,并不意味着每个现实的人在社会生产中都是生产者。总体人口是由少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组成的,前者 and 后者为消费人口,只有从事劳动的劳动年龄人口才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劳动年龄人口是全社会财富的生产者,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人口年龄结构反映育龄人口与非育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与少年人口、老年人口的比例,因此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对社会发展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 响,引起年龄结构变化的人口老龄化,当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传统的观点提出了以下的不利影响:

(一)在少年人口比重不变的情况下,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力资源相对减少,甚至出现劳动力不足,对发展生产不利。

(二)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老化。美国劳工局对不同行业中工人年龄增大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调查表明鞋厂、服装厂和家俱厂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在45岁以后明显下降,结论是劳动年龄人口老化对总体生产率提高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大。

(三)老龄化导致对老年人的供养系数上升,劳动年龄人口不堪重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88年的统计与预测表明,该组织成员国对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供养系数1951年为13.1,1985年为18.4,2000年为20.4,2025年为29.8。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把供养系数33.3定为不可超越的极限。

(四)老龄化导致国家用于老年人的养老、医疗保险支出大幅度增加,影响扩大再生产。

(五)老龄化导致依靠养老金生活的入口比重上升,结果是有储蓄能力的人减少,支出储蓄存款的人增多,不利于资本形成。

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某些不利影响,而且在老龄化加重情况下,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不利影响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缓解的。我们应看到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用科学的对策来减轻不利影响。

既然社会财富是人创造的,那么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要靠人来解决。人口的平均寿命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延长,在老龄社会更为明显。寿命延长必然带来有效劳动岁月的延长和劳动年龄上限的上移。这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增多,而且也促

使劳动力成本的下降。前苏联人口学家C·A·托米林在《人口学与社会卫生学》一书中指出：“平均寿命每增加一岁，就是经济状况的一项重大成就，因为这意味着‘无收入的’人的生命时降低了费用，也意味着大大节约了国民经济的资金，这种情况是国民经济平衡所估计不到的^①。N·N·麦奇科夫高度评价延长寿命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其理由是，延长寿命与保持劳动的力量和能力应该是协调一致的^②。

据联合国统计和推算，发达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1950~1955年为63岁，2020~2025年为75.6岁，尽管2025年的平均寿命比1955年延长了12.6岁，但是在统计上劳动年龄上限（65岁）却一直不变，仍然沿用70年前的标准。用这种标准计算出的结果能反映未来的现实吗？如果我们及时调整劳动年龄上限，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不会无限度下降，对老年人的供养系数就不会直线上升。劳动力不足也能有所缓解。另一方面，让人们利用延长的有效劳动岁月为社会创造财富，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可以推迟他们由生产人口向消费人口转变的时间，增加收入和储蓄岁月，减少国家负担。

至于老龄化造成劳动力不足的程度高低，劳动年龄人口老化对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如何，还要视当时自动化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定。自动化程度高不但能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人均产值更高，有利增强对非劳动力人口的供养能力。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认为：

“在发达国家里，工作所要求的条件对于体力要求越来越少，在那里，老年工人数目的日益增多，不一定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21世纪将是高技术大发展的时期，高技术发展必然导致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对劳动者智力的要求高于对体力的要求。约翰·奈比斯特在《大趋势》一书中指出：“在高技术的信息社会里，使用的是脑力，而不是像工业时代那样使用体力，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在现代社会里，老年人的智力和技能可以弥补体力的不足，不会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865年法国成为老年型国家，法国政府为解决老龄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重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发展经济，缓解了老化的不利影响。这个在老年型社会经历了130年的国家1991年人均国内总产值，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4个成员国中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居第4位。日本的老龄化速度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但在1970年成为老年型国家后，由于采用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在内的多种积极政策与措施，减轻了老化的消极作用，保持了经济不断增长的势头，创造了老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奇迹”。法国和日本的成功经验有力地证明老化与经济发展是可以相互协调，走向良性循环的。

三、解决老龄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速社会发展

维也纳老龄问题大会把老龄问题概括为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满足老年人特殊需要的问题，二是人口老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速社会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增强综合国力。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关键中之关键。

发达国家的人口老化是在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出现的，而且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对老龄化的发展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尽管如此，随着经济增长黄金时代的消失，特别是继石油危机而出现的经济危机，使社会保障制度走入困境，导致所有发达国家出现了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的困难局面。国际劳工局的研究报告认为：“目前所出现的‘社会保障危机’的主要起因不是领取养老金人数持续增加，也不是医疗技术不断进步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缓慢和

^① 引自：B·C·斯捷申科：《人口再生产的理论与方法》中译本第2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同上书，第239页。

失业问题严重。社会保障的危机，不是社会保障结构的危机而是经济基础由于营运不良而受到侵蚀所造成的……如果失业率下降，经济能有一个合理的发展速度，社会福利的支出是可以得到满足的。”这里所强调的是保障老有所养和所医要依靠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尚不发达情况下出现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更需要我们用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来增强对老龄化的承受能力。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它是国家和社会所运用的一种特殊手段，通过对公民在特殊情况下所遭遇困难与风险，提供物质帮助，维持其生活。社会保障的宗旨在于照顾弱者，老年人是其主要对象。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险，是老龄社会实现老有所养的可靠保证。对于老年人来说，保障、维持及保护收入是最为重要的。“保障收入”意味着作为一种公众政策应该确保老年人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一特定社会最低标准的生活费用。我们注意到社会进步一直被视为经济发展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发展经济列为处理老龄问题的首要措施。但是如果把发展只当作一种经过周密考虑的经济增长来看，它并不具备内部调整的功能。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要求“政府当局应确保这个进展过程不致过分损害那部分脆弱的人口，特别是受到各种变革之害的年长人。政府当局的责任是选择补救性社会行动方面的优先事项……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①

目前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以养老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发放养老金实现了对老年人的收入保障。但是经济不景气、失业人数的增加导致社会保障的支出上升和收入减少，不适应人口老龄化发展的需要，在基金筹集、管理与使用上尚待完善。另一方面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没有建立覆盖面较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对世界上的多数老年人来说，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能够普遍享受社会保障计划的保障问题。”^②

社会发展的中心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人的物质生活的提高上，而且体现在人的素质提高上，包括文化教育水平、智力开发和健康水平的提高。迎接老龄化挑战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让更多的健康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要求各国政府“研究人口老化对经济发展以及发展对老龄化的影响，以便使老年人的潜力得以发挥。”联合国的一项国际调查指出：“用来赡养有病和失去工作能力的人，以及为退休或过依赖生活的岁月提供生计的财富，不可能相当迅速地生产出来，除非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当然包括老年人自己”；“老龄社会最大的潜力（人力资源）就寓于老年人本身”。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前提是要有健康的身体和适应老年型社会发展的知识和技能。为此，1993年国际老年学大会把科学为健康老化服务作为大会主题。联合国制定的《2001年全球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方面的奋斗目标》强调：“开展健康老化运动旨在从整体上促进老年人的健康，从而使老年人在体力方面、才能方面、社会方面、感情方面、脑力和精神方面得到平衡发展”。以提高老年人的素质为中心的健康老化是社会成功地处理老龄问题的必要基础，也是协调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老龄化与社会发展不存在绝对对立的矛盾，只要我们认真研究，正确对待，消除不利影响，利用积极因素，二者是可以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的。

（本文责任编辑 朱 犁）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① 参阅《老龄问题研究》第51~74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

② 赛尔比：《老龄化的2000——对社会的挑战》，三联书店，1987年版。